

近代中国人 为何用井田制解读社会主义

□ 孙建昌

核心阅读

20世纪初，有着不同政治倾向、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的中国人，在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思想之后，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把社会主义和井田制画上等号呢？本文试图阐述这个疑问。

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开始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初识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不约而同以中国古代井田制解读社会主义。开此先河的是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本杂志《译书汇编》。1901年1月28日出版的《译书汇编》第二期，连载了留日学生翻译的《近世政治史》第三章第一节“社会党之由来”，其中有一段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文字，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社会云者，盖谓统筹全局，非为一人一家计也。中国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这段文字要言不烦却内涵丰富，不仅明确点出是“谁”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而且阐明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原因是“为佣工者，受资本家之压制”；不仅指明社会主义主张“均贫富、制恒产”，而且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统筹全局，非为一人一家计”。最值得玩味的是，文中直接把中国古代井田制等同于社会主义。

革命派和维新派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相似

把中国农耕文明时代形成的一种早已不复存在的古老土地制度，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画上等号，《译书汇编》中的这种解读虽然开了先例，

却并非个例。20世纪初，以在日本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人士为代表，几乎异口同声地把社会主义和中国古代井田制等同起来。孙中山明确指出：“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虽然孙中山在这里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均产主义”并不准确，但他显然从社会主义想到了井田制，又以井田制解读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在以井田制解读社会主义的同时，公开申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话语体系中，“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在当时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对“Socialism”的不同译法而已，在内容上二者指称的是同一个东西。同样在日本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虽然没有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民生主义，但同样以井田制解读社会主义。梁启超就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那么，这里就引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20世纪初，有着不同政治倾向、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的中国人，在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思想之后，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把社会主义和井田制画上等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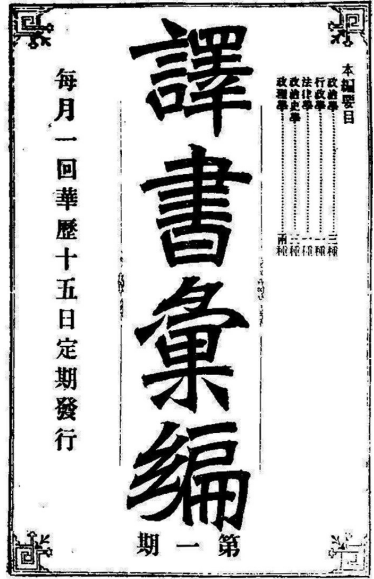
井田制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井田制。汉语文献中关于

井田制的记载，见于《孟子·滕文公》。其文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据说井田制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已存在，而在西周时期盛行。我们知道，《诗经》里面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就是说，西周时期，周天子是整个“国家”的代表，举国的土地都归周天子所有。因此，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是一种“国有”的性质，周天子“封土建侯”，诸侯国土地上的百姓是不能拥有土地的，他们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此，井田制时代不存在土地的买卖，不存在土地的兼并，没有“土豪”的存在，井田制的这种“土地国有”性质和“分配公平”原则，几乎完美地契合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加之其在耕作方式上体现出的“先公后私、公私分明”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契合，于是在早期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人心目中，井田制成为了天下为公、公平公正的象征，其核心意涵，集中体现在一个“公”字上。加之井田制时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社会风尚，又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若合符节，给人以心向往之的美好想象。正是这样一种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价值理念契合，才使20世纪初了解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和井田制画上了等号。

接受规律使然

从思维惯性和文化心理来看，以本土文化中国有的观念和事物去



《译书汇编》第一期

比拟外来文化蕴含的观念和事物，大概是人们理解和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普遍倾向。因为让人对一种新思想产生认同的最有效方式，大概就是使他们相信，这种观念和事物是其自身文化中所固有的、是与他们自己的文化相吻合而不冲突的。这样他们才易于借助自己所熟悉的观念或事物，去认识和接纳某种新思想，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早期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以井田制去解读社会主义，大概就是这样思维习惯和文化心理使然。这样的联想和解读，带来的结果是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折射出的是中国人“天下为公”的文化情怀。这种文化情怀、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史学漫谈

隋唐时期的北道丝绸之路

□ 李大伟

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交通凡有南、中、北三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中南道与中道早在汉代便已成为沟通中国与域外的主要通道，即汉代丝绸之路北道与南道。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北道（又称“北新道”）开通之后，传统的丝绸之路北道被称为中道，由此形成了北道、中道与南道的交通格局。

裴矩所记丝绸之路北道的开通与此时丝绸之路贸易局势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上波斯帝国凭借丝绸之路贸易中转地的地理优势，控制并垄断了中国的丝绸贸易。6世纪中叶，西突厥占领河中地区，这些地区的粟特人素以经商闻名，常往中国经营丝绸贸易，但因丝绸销往西方的通道被波斯人控制，因此西突厥派遣粟特人使团两次到达波斯，期望能够在波斯经营丝绸贸易，但波斯人为了垄断贸易并未善待突厥使团，甚至杀害之。

为了打破波斯人的贸易垄断，西突厥遂决定将生丝直接销售给西方的拜占庭人——拜占庭人也因波斯的贸易垄断而经常苦于高价获取丝绸等东方物资。西突厥可汗室点密派遣粟特人使团翻越高加索山前往君士坦丁堡，双方遂建立联盟关系；拜占庭随后又于569、576年分别派遣以蔡马库斯、瓦伦丁为首的使团前往西突厥。据拜占庭史学家记载，蔡马库斯在从西突厥返回君士坦丁堡之时，即经恒逻斯、锡尔河，后沿咸海经恩巴河、乌拉尔河以及伏尔加河，再经里海东北岸、高加索中部到达黑海岸边，又乘船到斐西斯河口，再至特拉比宗，最后于571年秋抵达君士坦丁堡；576年，拜占庭使节瓦伦丁第二次率使团出使西突厥，则乘船从黑海南岸希诺普出发，先到达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赫利松，再沿亚速海东岸地区，经里海北岸到达西突厥。蔡马库斯与瓦伦丁前往西

突厥的道路，大致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先至黑海地区，再经高加索至里海，最终到达西突厥汗廷。

裴矩所记丝绸之路北道，即为拜占庭与西突厥使团所开辟的贸易通道，不同的是裴矩记载了由此道入华的路线。具体而言，即从伊吾出发，经天山北麓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部——7世纪初天山北部铁勒部摆脱西突厥控制，建立汗国，并先后迫使焉耆、高昌、伊吾臣服；但是619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继位，吞并铁勒，又抵达波斯、属宾，控弦数十万，故裴矩所记铁勒部此时已被并入西突厥，再经其地而达突厥可汗廷——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时曾移廷于石国北之千泉地区，永徽年间（650—655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反叛唐廷之后，建牙于双河与千泉；隋唐时期前往西突厥地区经常选择途经千泉，此道行人较多、较为通畅，故裴矩所记突厥可汗廷应为千泉地区。

6世纪中叶此道开通之后，即成为中国与域外联系的交通孔道。唐代唐太宗时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唐高宗李治灭西突厥，设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治理，并在丝绸之路东段的大漠南北与西域各国修了很多支线通往丝绸之路，亦称“参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因此丝绸之路北道交通更加便利。

唐代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与西域诸国不断派遣使节到长安与中国相通，阿拉伯、粟特、犹太与波斯商人纷纷入华贸易，敦煌、阳关、玉门与长安等地常见这些商人的身影。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术也传入了阿拉伯帝国，之后又经此传入西方诸国，促进了欧亚诸地知识的传播与思想文化的交流。

世界史林

（上接1版）

为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了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的根本指针、目标导向和着力点，强调更加注重党的政治建设这个根本性建设、思想建设这个基础性建设，把执政本领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加强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武装，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着力加强组织体系建设，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定盘星”，也是必须长期贯彻的“纲”和“本”，必将指引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不断谱写新篇章、开辟新境界。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是要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切入点、结合点、发力点，切实把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使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更加科学、更加精准、更加有效。

突出学懂弄通做实，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必须旗帜鲜明地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工作主题，加强思想宣传教育，引领各族人民心向党、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中之重就是要着力推进深化、转化、常态化，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与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有机融合，把学习成果聚焦到深入推进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发展实践。

突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

系去实现。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必须更加注重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分类别具体指导、分领域统筹推进，在2016年以来连续开展“基层党建推进年”“基层党建提升年”“基层党建巩固年”的基础上，2019年将在全省实施“基层党建创新提质年”，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突出忠诚干净担当，着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键。必须突出政治素质，善于抓住本质，坚持事业为上，注重日常经常，强化干事导向，把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体系进一步做扎实、做到位。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建立健全科学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容错纠错机制，大力选拔使用敢负责、勇担当、善作为的干部，充分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突出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我们必须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以重大人才工程为牵引，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为着力点，大力实施“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广纳天下英才，围绕跨越发展聚人才、瞄准产业发展用人才、面向未来需要育人才、突出紧缺引人才，努力建设一支矢志爱国奉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

突出高素质专业化，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我们必须以大力发现培养为基础，以强化实践锻炼为重点，以确保选准用好为根本，从严管理监督为保障，坚持培养与使用并重、严管与厚爱结合、数量充足与质量优良兼顾，由满足近期需要向重视战略发现培养转变，由偏重“选”向统筹“选育管用”转变，由粗线条运行向精准科学实施转变，突出政治历练和实践磨炼，加快培养一支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

帝国文明取代王国文明

——从秦始皇陵考古看秦文明（三）

□ 段清波

阙是由黄土夯筑而成的高台木构建筑，是最富中国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建筑。“阙”在《说文解字》中释为“门观”，《古今注》说：“阙，观也。”“阙”常独立对称地出现在帝王都城、宫殿的大门外，分城阙、宫阙、祠庙阙、陵墓阙等类别。阙由来已久，由甲骨文有阙的形象字推测，至迟在商代晚期便有了相关的建筑；西周时，阙的礼制性已有所体现，仅王室和鲁国可使用。春秋战国时，原本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这种独立的阙的形式，在列国相继出现，成为诸侯国王宫的象征，此所谓“礼崩乐坏”，社会失序。

中国最早的代表皇帝专用的三出阙，就出现在秦始皇陵。秦始皇陵由两道围墙分别合围成内外城垣，三出阙建筑遗址在封土东西两侧的内外城门之间，各有一组，相互对峙。这表明秦统一后，在原有单阙的基础上，整合而成了完整的阙制，即皇帝使用三出阙制，等而下之者两出阙，再下者单阙，平民是不能使用的。这与秦帝国确立的新的社会架构相匹配，是帝国制度整合的重要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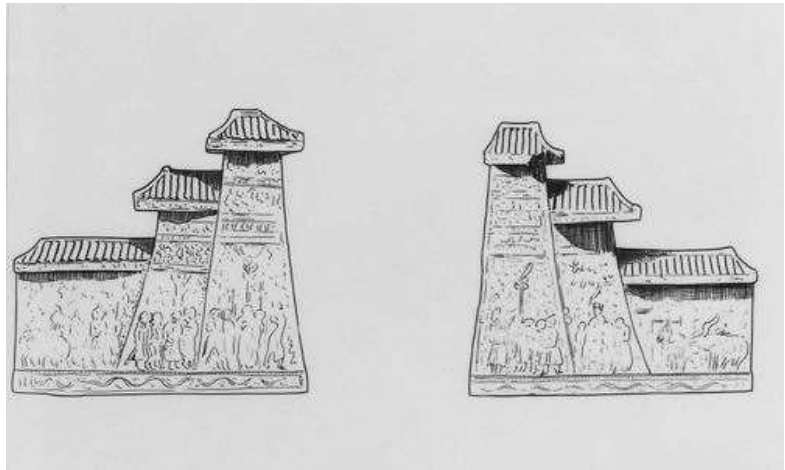
耸立了2200多年的秦陵封土，迄今依然巍峨壮观。尽管因为秦末起义，致使陵墓封土没有最后完

工，但帝国威势仍旧赫然醒目。秦陵封土无论是体量还是规模都是空前绝后的，其现存高度为50多米。中国古代陵墓封土的出现，大致在东周时期。封土的出现由长江流域向北影响到黄河流域，其发展变化，也是由春秋之前南方地区的土墩墓影响至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在战国晚期时，封土才进入河西的秦国。

三出阙与封土一样，都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物化表现。秦始皇之后，不论帝王陵墓封土的形态怎样变化，但统治者以高大封土来彰显皇权至上的“非壮丽无以重威”理念都如出一辙。这种标志性建筑形态延续至清代。

在中国历史上，秦的历史和文化是独一无二。秦人的祖先出身于大西北的黄土高原间，与戎人部落长期相邻而居。从最初缘起于中国西部，到后来历经征战而统一四方，秦经历了从古国、王国到帝国的发展历程。秦人所创造的帝国文明，是延续了约2500年的王国文明之后，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第二次质变，影响东方世界2000多年。

与秦代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创新发展一样，秦始皇陵的外藏系统也表现出了一种发展的同步性，即继承、突破和创新并



宫阙前三出阙构想图

存。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陵园，它集中了秦代文明的最高成就。200多座陪葬坑群体所展示的内涵远超一般的想象，一套完整的秦帝国的管理体制在地下被再现。换句话说，秦始皇死去时，带走的是一套政治体制，是适应东方地缘国家需求的社会治理体系，因为他知道，在他的时代，仅依靠血缘治理国家是不可能的。

百代行秦政，秦始皇不仅将列国统一，他在制度整合上的思虑和措施更周详。秦代第一次统一帝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建立

了中国版图的雏形，以完备的法治创建了一套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秦始皇和他的幕僚所开创和构建的大一统理念，依法治国、中央集权郡县制等制度文明，成为帝国时期中国社会运行的基础，改变了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